

序言

盧偉力（資深藝評人、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小組主席）

生命與文化的互動

舞蹈評論受到關注，是香港舞蹈文化近年一個可喜現象，而且愈來愈多人有志舞蹈評論。

舞蹈作為身體展現，古已有之，或許比文字，甚至語言更早出現於人類文明；作為人際溝通、族群活動的方式，表達思想感情、敘述事件，相對地較後出現；作為藝術形式，甚至文化論述，則又再晚出；對舞蹈的評論自然又再晚出了。

所以，香港舞蹈評論的發展，標誌着香港舞蹈生態走向完善。

舞蹈評論是對舞蹈文化現象進行整理、分析與論述的活動，狹義的關乎演出、舞者、舞團，廣義的關乎藝術思潮、文化史、美學哲學，是感知記述、歷史綜合、理論研究，以及價值判斷的匯通。無論狹義廣義，要更上一層數，都要講究方法學。

《拾舞話：香港舞蹈口述歷史（五十至七十年代）》，顧名思義，是以口述歷史方法整理關於香港舞蹈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，可以說是香港舞蹈文化史的整理，亦屬廣義舞蹈評論活動。

作為一種社會存在，舞蹈在香港也許可以追溯到英國殖民地時代。衣香鬢影、外國僑民、高等華人，在歷史的天空下，也許還有不少未發掘的故事，若隱若現殘留在某些建築物中——張愛玲小說《傾城之戀》就描寫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前夕上流社會的舞場。然而，亦在

這個地方，在日本軍事佔領香港「三年零八個月」之前，時代風雲之際，曾經有過現代舞的試演。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中國著名舞蹈家戴愛蓮（一九一六—二〇〇六）三十年代在歐洲修習現代舞，學成後回國投身抗日，曾在香港停留過一段日子，為「全世界反法西斯大聯盟」籌款演出。烽火故鄉，八方文化人聚首香港，白雲裏有揮之不去的寄托。

和平後，國共和談不成，四十年代末中國內戰。這是中國政治巨變前夕。這是一個有趣的年代。當時有相當蓬勃的中國民間舞、民族舞，甚至青年社交舞、土風圓舞等運動。在左翼文化圈、左翼工會、學校，甚至有過一陣秧歌舞熱潮，彷彿「一萬年太久，只爭朝夕」（毛澤東語）。火紅的聲音，太強烈了，於是香港政府驅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原劇藝社，他們便轉輾到東南亞活動。

所以，香港舞蹈的起動，是與社群從屬有直接關係的。這份社群從屬，一直在這城市的不同角落滋長。在七十年代中香港本土文化意識崛起後，出現了以藝術探索為主要方向的香港舞蹈，並在小眾有心人推動，以及政府文化政策突破之下，香港舞蹈發展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標記——專業化。

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——《拾舞話》時間框架一端是中國政治巨變之後，另一端則是香港舞蹈藝術躍進之前。兩位研究員李海燕、林喜兒，在歷時近兩年的訪談與整理過程，各有所得，寫了很用心的文章。李海燕從文化研究角度去理解這次「口述歷史」，拈出「舞蹈發生的場所」、「社會背景與身分建立」、「身體的器物觀」等探討方面，並肯定那一代從業員「即使未至於積極地利用舞蹈向群眾作意識形態的展示，也會因為舞蹈長期在民眾的視線之內而負有使命感，影響了他們

如何思考舞蹈本質和展示內容。」林喜兒則關注「在五、六十年代的政治漩渦中走過來的舞蹈」，她從香港文學關於「南來文人」與「美元文化」的一些論述中，折射出香港舞蹈文化中政治的蠢動與潛流。

「口述歷史」並非單單是史料搜集的途徑，它是動態的，更大的價值在生命與文化的互動。一方面，它記述了過來人親述人生經歷、回顧行實、感悟詠嘆，甚至檢討評析；另一方面，它推動着今天的採訪者與讀者對訪談者過去了解的同情，以及思考訪談題材在今天可能衍生的意義。

十位資深前輩：吳世勳、吳景麗、郭世毅、梁漱華、梁慕嫻、楊偉舉、鄭偉容、劉兆銘、劉素琴、鍾金寶 (Joan Campbell)，在那時香港特定的文化氛圍，參與過舞蹈工作。讀着他們的口述歷史，可以了解那個

時代的一些事情，更重要的是，能體會到十份有血有肉的仍未散去的對香港、對舞蹈、對生命的熱情。

感性與理性融合，時空與時空互動。

我相信，通過融合與互動，能開始未來的路。